

日本20世纪50—80年代的《楚辞》研究

王海远^{*}

【摘要】 20世纪50—80年代日本学者的《楚辞》研究比之上半世纪,表现出明显的进步,他们已不满足于沿着中国乾嘉传统前进,希望能够走出一条有着日本学者自我特色的研究之路。在方法上,更重视地下文物的发现,用之以与典籍文献对照,还十分注意从民俗学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研究,可谓三重论证。在观点上,日本学者从哲学、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等角度出发,力求阐发个人的见解。还有些日本学者作出了具有整体性的论述,体现出一种宏观性的眼光与建立体系的雄心。

【关键词】 日本;楚辞研究;多学科性;宏观性

一、概貌综述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走出了低谷,《楚辞》研究也大抵如此。当然这其中有着一些个别的原因,日本国学院大学的浅野通友教授对此曾有过解释,“《楚辞》这种文学,人们一向不太熟知。但是最近突然受到极大的关注。而且,原先从史学的角度主张楚国是日本人的故乡这一学说也引起人们的思考。既然日本人的故乡是楚国,祖先是楚民族,而且其文学史是《楚辞》。那么,《楚辞》受到重视则是理所当然的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前年田中首相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将《楚辞》注本——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作为礼品赠送田中首相。可以说以此为转机,一时引起了对《楚辞》的高度关心。”1955年,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史学访问团访日,就中国的历史分期问题和日本历史学界进行交流,对于日本的汉学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此一度完全中断的中日学术界恢复了交往,并相互影响。日本的战后汉学研究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这一阶段的日本学者的楚辞研究特点有以下几项:

第一,用和中国人相同的思考方法与感受方式来理解中国。这一时期的日本汉学家大抵有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对于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方向和动向相当了解,与中国学者又多有联系,并相互之间时常探讨切磋,因此能够以中国人的思考与感受方法来理解《楚辞》。据吉川幸次郎回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京都大学凡是与中国学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原则上都被派往中国留学,这已经成为了一种

^{*}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215009。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楚辞学研究”(15BZW054)阶段性成果。

传统。吉川幸次郎说：“留学的最大收获是懂得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在学术范围内来说，就是知道了中国人推崇什么学术，看不起什么学术，对此取不取同调是另外一回事，至少我是在认同这样的价值下而开展自己的研究的。”^①

第二，实证主义的治学方法。严绍璦在其《日本中国学史》一书中指出：“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强调确实的事实，注重文献的考订，推行原典的研究。”^②这一时期的日本学者强调要发现能与原有的文献资料相印证的新实物和新文献，并且他们对新出土文献资料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我国学者。

第三，在处理和资料的时候重归纳而不善于演绎。他们注重尽可能地详尽收集和自己研究主题相关的各种研究材料，尤其是新发现的文物文献资料以及一些能够提供佐证的民俗学资料，然后通过整理、归纳，得出他们认为真实可信的研究结论。所以这一时期的日本汉学家们的治学方法大致是：发现新材料—对原有文献进行考订—对材料重新分类归纳—得出结论，而其中“发现新材料”则是最为关键的环节，是整个研究的立足点。相对于归纳来说，很多日本汉学家并不善于演绎。演绎是一个具有“创造性”和“发明性”的工作，如果做得不好，容易得出自以为正确、实际上却是错误的结论。现在的日本学者重归纳、轻演绎的治学态度，一方面是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所导致的，但是另一方面多少也表明了他们对对中国文献及新出土资料的把握和理解能力尚有不足。

第四，在研究时，注重对个别史料的研究而忽视对整体的把握。具体表现为，在对某一时代的某一事件及其产生的具体原因，以及某一制度的具体演变过程的研究上，日本学者能够显示出其深厚的功力和良好的考据水平，并获得中国学界的一致赞赏。但是一旦涉及到总体把握时，就显示出日本学者的不足了。当然也有一些日本学者是具有统领全局的学术研究能力的。

正是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之下，《楚辞》研究又一次成为中日两国学者所共同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并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在研究《楚辞》的时候，开始不满足于沿着中国乾嘉传统前进，希望能够走出一条有着日本学者自我特色的研究之路。于是很多日本学者开始尝试利用新的资料，使用新的方法对《楚辞》加以研究。

二、步履维艰：《楚辞》研究之渐变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楚辞》研究相比于以前可谓得到了长足发展。首先，研究范围被大大的拓宽了，他们不仅对楚辞作品本身进行研究，也对屈原的身世、人生经历，楚地的风俗民情、文化历史，屈原及楚辞对于后世的垂范，甚至还对中国历史上历代有影响的《楚辞》注本进行述评；其次，以新的研究视角、新的材料为基石尝试对《楚辞》进行全新的解释，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再次，在从事《楚辞》研究的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日本汉学界执牛耳者。如青木正儿、目加田诚、藤野岩友、星川清孝、吉川幸次郎、赤冢忠、竹治贞夫、白川静、黑须重彦、大宫真人、三泽玲尔、浅野通有以及小南一郎、石川三佐男、稻畑耕一郎等。

这一时期的日本《楚辞》研究，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表现方式，一、在编写中国文学史著作的过程中涉及到与《楚辞》相关的章节；二、对于《楚辞》注译本以及对于屈原本人的研究；三、专论著作的出现。

^① [日]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钱婉约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3—4页。注：本论文中凡引用之日文文献除注出翻译者外，其余均为笔者所译。

^② 严绍璦：《日本中国学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3页。

在编写中国文学史过程中涉及《楚辞》而用力较多者当属青木正儿^①、吉川幸次郎^②等。青木正儿对于自己的《楚辞》研究历程作过详细说明：“我最初开始读《楚辞》，是在第五高等学校（现熊本大学的前身）的学生时代，选入汉文教科书的《九歌》和《九章》等几篇。当时很感兴趣，想读到其他部分，到旧书店寻找，结果找到了线装本的《楚辞灯》。马上开始阅读，但感到晦涩难懂，便到学校图书室阅览《集注》的线装本，非常易懂。记得再到熊本的旧书店找《集注》却没有结果，只好频繁地到图书室去借阅《集注》。后来做教师，到如今为止，讲读过四次《楚辞》。第一次在东北大学用的《集注》，第二次在京都大学用的《山带阁注》，第三次在立命馆大学用的《王注》，综合以上经验，觉得《集注》最好，所以第四次在山口大学还是用的《集注》。《集注》最好的部分是对《离骚》《九歌》《九章》的批注，而《天问》《远游》《招魂》《大招》等部分几乎没有超出《王注》《补注》的地方。总之先从《集注》入门，然后往上走到《王注》和《补注》，再后涉猎群注，这就是我的学习《楚辞》的历程，我觉得对后进诸君也是最好的方法。”^③

青木正儿原本以研究戏曲见长，其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中国近世戏曲史》。故其在《楚辞》研究中，除了他对《楚辞》文本的理解之外，还加入了其《戏曲史》一书中的见解。青木正儿另有题为《楚辞九歌的舞曲式结构》的论文，其中观点也与《戏曲史》中的见解相关，青木正儿说自己是“以读后代戏曲的心态来提出自己的见解”^④的。在文章中，作者从中国古代的民间歌舞祭祀为切入点，通过引述中国历代多家楚辞注本的研究成果，最终认为《九歌》当为祭神之歌舞，主要显示了祭神者对神的至诚和有关神的事迹习性等。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九歌》各篇的旨意按上述两类内容作了区分：第一类，向神致以祭者的至诚者，其中，表现宗教至诚的，共三篇——《东皇太一》《云中君》《礼魂》；表现恋爱情感至诚寄托的，也是三篇——《湘君》《湘夫人》《少司命》；第二类，演示神的事迹习性者，其中，显示宗教教训目的者，是《大司命》《国殇》二篇；显示宗教的兴味与目的者，共三篇——《东君》《河伯》《山鬼》。^⑤同时作者也指出，《九歌》深受楚国巫风的影响，并按照歌舞剧的形式将《九歌》中的篇章来加以展示，这和闻一多的《九歌古歌舞剧悬解》^⑥一文颇为相似，显示了中日楚辞学者在对《九歌》理解和阐释上的一致性。

吉川幸次郎热爱中国文化，年轻的时候喜欢穿中国服装，说中国话，自称是“段玉裁之徒、钱大昕之徒、18世纪清儒之徒”，与当时日本普遍蔑视中国的潮流相对立。吉川幸次郎和青木正儿一样，专业也是以戏曲为主。他的《中国文学史》是一个名叫黑川洋一的学生在毕业二十六年后，根据他对吉川幸次郎的讲课内容的记录，丰富、扩充而成^⑦。其中涉及楚辞的部分，仅是第三章的第三小节《楚辞文学》，共计千余字左右。但他另专门撰写了《诗经与楚辞》一文，首先对先秦时代及其历史条件作了详尽的论述。作者明确指出：这是一个不完整的历史时代，因为历史文献中传说的成分较多；是一个文献大多无作者的时代；是一个因政治权力分散而造成多种区域文化并存的时代；是一个尚未有稳定词汇和语法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文学价值尚未被充分认识的时代。有鉴于此，作者进一步指出：由于战国的纷乱导致中国北方地区人们对诗歌的兴趣大不如从前，而楚辞能够兴起，正是因为它处在南方文化圈内；

① [日]青木正儿(1877—1964):是昭和初期中国文学学者。酷爱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对狩野君山、内藤湖南等建立的京都中国学派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著作有《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文学艺术考》《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华名物考》《李白》等,译注有《新译楚辞》《元人杂剧》《芥子园画传》等。遗著有《青木正儿全集》十卷。

② [日]吉川幸次郎(1904—1980):是日本战后研究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学者,担任过京都大学教授、文学部长,日本中国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吉川幸次郎全集》三十二卷、《尚书正义》四册、《中国学的问题》《中国人的古典及其生活》《元杂剧研究》《制度通》《汉武帝》《新唐诗选》《杜甫诗注》《中国文学史》等。

③ [日]石川三佐男:《二十世纪日本楚辞著作目录解题》,未刊本,第35页。

④ [日]青木正儿:《楚辞九歌的舞曲式结构》,《青年界》1933年第3卷第4期。

⑤ 徐志啸:《日本楚辞研究论纲》,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28页。

⑥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楚辞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7页。

⑦ [日]吉川幸次郎、黑川洋一:《中国文学史·序》,东京:岩波书店,2002年。

楚辞有着比《诗经》强烈得多的感情色彩,楚辞的文学主题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它比《诗经》的怨刺来得更为深沉而忧郁,但是都表现了同一种精神——不甘心屈服于命运的支配。作者认为楚辞的最大特征是其具有着一种政治性的表现特质。吉川幸次郎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涉及广泛,著述丰富,是日本汉学界的大师级学者,他的楚辞研究虽用力不多,但其见解确有独到精辟之处。

对于《楚辞》注译本以及屈原本人的研究,当以目加田诚^①、竹治贞夫^②为代表。目加田诚本身并不是研究《楚辞》的,他对《诗经》用力较多,有很多成果。他的楚辞研究正是承接《诗经》研究而来,其研究《楚辞》的著作《定本楚辞译注》是根据他在九州岛大学多年作《楚辞》讲座的讲稿写成的。在此之前,目加田诚曾出版过中国古典文学全集《诗经·楚辞》^③。作为其改订版,又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大系《诗经·楚辞》^④。该书正是以上述平凡社版本的旧版为底本,加入了翻译和大量的个人批注增补而成。书名中的“定本”二字即由此而得。此书从楚辞的句型、音节、用韵、句法等诸多方面对楚辞的形式作了探讨。《定本》一书收录的《楚辞》译注,包括《离骚》《九歌》《天问》《九章》《卜居》《渔父》《招魂》《大招》《远游》诸篇,长短共二十七篇。《定本》一书和另外刊行的《屈原》^⑤一起,以其优美流畅的译文广受欢迎。

竹治贞夫在楚辞研究上可以算是一个成果丰硕的学者,他所作的屈原传记非常具有特色。他以屈原的家族史为切入口,将屈原的人生分为六个时期:修学时代、宫廷时代、失脚时代、汉北配流、江南流滴、忧愤的晚年,并且将屈原的作品按照作者自己的理解判断归入各个时期当中,如将《天问》《橘颂》归入修学时期,《九歌》归入宫廷时期,《离骚》归入失脚退隐时期,《抽思》归入汉北配流时期,《哀郢》《涉江》归入江南流滴时期,《怀沙》《招魂》归入忧愤的晚年时期。虽然我们目前对于屈原的作品分期问题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但其将作品和个人的生平有机结合的写法,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处理方法。

随着楚辞研究的推进,楚辞研究的专论性著作逐步开始出现。这一阶段当以赤冢忠^⑥、藤野岩友^⑦、竹治贞夫、黑须重彦、小南一郎^⑧等人为代表。

赤冢忠同《楚辞》相关的著作是《中国古代的宗教与文化》^⑨,另外其《赤冢忠著作集》^⑩第六卷的全部内容都是《楚辞》研究方面的。在这其中赤冢忠分别论述了:哲学与文学的关系;《离骚》的意义;《离骚》的形式;《楚辞·九歌》的构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楚辞·天问篇》的文学意义;《楚辞·天问篇》的新解释以及《楚辞·九章》的研究——从抒情到戏曲等多个问题。

赤冢忠首先表达了这样的文学史观:在中国,哲学与文学拥有同样的源头,然后通过分离、交错、背反而各自发展。从这一文学史观出发,作者不同意将《离骚》认定为屈原吐露忧愁之情的长篇抒情诗这样的旧说,认为《离骚篇》是哲学与文学开始明确分离时期的文学作品,是“歌舞剧”,是“悲剧”。

① [日]目加田诚(1905—1994):九州岛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著作有《风雅集——中国文学的研究与杂感》《杜甫物语》《洛神赋——中国文学论文与随笔》《屈原》《唐诗散策》《目加田诚著作集》全八卷,译注有《诗经·楚辞》《唐诗选》《杜甫诗集》等。

② [日]竹治贞夫:德岛大学教授,当代日本的《楚辞》名家。著述甚丰,多独到之见。他不仅撰写了《忧国诗人屈原》,编了《楚辞索引》,还出版了论文集《楚辞研究》。该书可谓集大成之作,集中阐述了他对楚辞的一系列精辟见解,为学术界所赞誉。

③ [日]目加田诚:《诗经·楚辞》,东京:平凡社,1960年。

④ [日]目加田诚:《中国古典文学大系》,东京:平凡社,1965年。

⑤ [日]目加田诚:《屈原》,东京:岩波新书,1967年。

⑥ [日]赤冢忠(1914—1983):文学博士,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古代思想。先后任职于神户商业大学预科、东京大学文学部副教授、教授,二松学舍大学教授。著作有《古代中国的宗教与文化》《书经·易经(节译)》《庄子》《石鼓文》《新字源》《研究汉文》等。遗著有《赤冢忠著作集》全七卷。

⑦ [日]藤野岩友(1898—1984):文学博士,历任明治大学预科教授、国学院大学教授,楚辞研究家。著作有《巫系文学论》《中国的文学与礼俗》等,译注有《楚辞》。

⑧ [日]小南一郎(1942—):文学博士,京都大学教授。著作有《楚辞》《楚辞与其注释者研究》。

⑨ [日]赤冢忠:《中国古代的宗教与文化》,东京:角川书店,1963年。

⑩ [日]赤冢忠:《赤冢忠著作集》(第6卷),东京:研文社刊,1982年,第7页。

他进一步将《离骚篇》分为主角与男女随从的歌,并附上口语翻译,为使这个诗剧的情节更好理解,将其排列成剧本的形式。而且作者将主人公灵均的灵界游行和战国诸子的思想关联起来,提出“灵界”是诸子向往的“天”的体现这样一个新观点。^①

赤冢忠认为《天问篇》中有很多重要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他从校订和复原《天问篇》诗句的序次作为出发点,认为《天问篇》中蕴含着某种统一的主张,《天问篇》的目的,是立足于一定的历史记述或传说的基础之上提出设问,以探求对有关问题的更为详细的答案。赤冢忠又将《天问篇》与屈原的其他作品进行比较,从二者的表现中看到事实的内容、构思的一致。于是,赤冢忠得出结论认为,《天问篇》的作者是屈原,作品成立的时期与《九章·哀郢篇》为同一时期。作者又探讨了《天问篇》在文学史上的位置,结论是《天问篇》属于古叙事诗的最后阶段。^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赤冢忠从《天问篇》中存在很多错简这个现象出发,尝试将句子作出各种各样的排列。^③对《天问篇》作重新排列的尝试在中国以台静农的《楚辞天问新笺》^④最为出名,但赤冢忠的尝试远远超过了台静农。这一部分内容是赤冢忠该书中最长的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全书最为重要的部分。

黑须重彦著作有《〈楚辞〉与〈日本书纪〉》^⑤一书。该书重点考察了以下三个问题:《楚辞》成立的过程、《楚辞》的古典化以及《楚辞》是翻译文学的一个证据。

黑须重彦认为《史记》以前没有“屈原、楚辞”之语,和“楚歌”一词相比,“楚辞”一词较新,在“楚歌”一词消失的同时,“楚辞”一词出现了。这也就意味作者并没有把《史记·酷吏列传》叙述朱买臣的部分中,首次出现的“楚辞”一词当作作品集来看待,而是视其为“楚语、楚的语言”之意,认为精通楚语的朱买臣和严助同为刘安向武帝进献《离骚传》的中心人物。读了这个进献的《离骚传》的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还载入了《怀沙赋》及作为其序词的《渔父》,并明言他读过《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算下来共计六篇是司马迁读到的作品。那么从屈原到《史记》之间的约二百年间,“楚辞”与“屈原”到底以什么形式存在于什么地方?从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黑须重彦认为,楚辞是用楚语吟诵的作品,被精通楚语的朱买臣或严助翻译成了汉语的。

还有一个问题,司马迁读到的六篇以外的作品,到底是怎样出现的?黑须重彦推测是由西汉王褒和九江被公等人通过合作将旧楚地口头传诵下来的作品翻译成汉语的。作者并且推论,后来刘向也加入其中,将司马迁没读到的《九歌》《九章》等作品整理完成,《楚辞》中的主要作品就是这样成立的。也就是说,从楚语到汉语的翻译工作,最终是由王褒、刘向在西汉末年完成的。

作为证实以上翻译过程存在的证据,黑须重彦举例说,“嫫”等绮言丽语是翻译词汇;将少数民族土语歌谣翻译成现代汉语时,代名词的区别使用在汉语中很难表达好。经过与中原的《书经》《诗经》《论语》《孟子》《左传》等等的比较,发现原“楚辞”中代名词丰富,且相互间有着微妙的区别,相当于第二人称“君”的代名词“荪”在中原汉语中无法表达。第一人称“我”的使用方法,在司马迁读到的六篇作品中,《天问》《渔父》《招魂》是作为主格来用的,《离骚》中没有主格的用法,而西汉末年成立的《九歌》《九章》的歌群中存在这种用法。所以可以认为,司马迁读到的《怀沙》的主语“吾”本来是“我”。作者提出,从代名词用法和中原文献的不同来看,在屈宋作品成立和解释的过程中,必须考虑从古代楚语到古典汉语的“翻译”,即从“声音”传承文化到文字文化传统这一要素。还值得特别提到的是,黑须重彦认为作为篇名的“天问”二字本来和文中起首的“曰”字连为一体,这样“天问”可以按本来语序解释为“天帝发问”。^⑥

①②③ [日]赤冢忠:《赤冢忠著作集》(第6卷),东京:研文社刊,1982年,第52页、第126页、第136页。

④台静农:《楚辞天问新笺》台湾:艺文出版社,1972年。

⑤ [日]黑须重彦:《〈楚辞〉与〈日本书纪〉》,东京:武藏野书院,1999年。

⑥ [日]吉富透:《论〈楚辞·天问篇〉与战国楚简类的历史认识》,《中国出土学会会报》2008年第30号。

小南一郎的《楚辞与其注释者研究》则重点讨论了《楚辞》作品的内容与成立年代和《楚辞》的注释者们及其注释态度这一问题。

小南一郎放弃了传统的将《楚辞》作品和屈原个人生平联系起来的解释方法,而是将其理解为战国后半期到汉代这一激荡的历史时期中“楚人们”在苦恼中创造的文艺。作者要求将《楚辞》作品“放回其形成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来理解”^①。

在绪论《楚辞文艺的编年》中,作者根据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来认定其产生的年代。他提出,《九歌》《招魂》是在楚国进入战国后半期以前就已经形成的楚辞文艺的前期作品,《离骚》《天问》是战国末期到汉代初年的激荡时期形成的楚辞文艺的中期作品,剩下的《九章》《远游》等则是在秦汉时代创作的楚辞文艺的后期作品。^②

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个认定,小南一郎以《九歌》和《离骚》中时间意识的差异为中心,参考了伊利亚德的时间论,对两篇作品的前后关系进行了讨论。同时作者以《天问》的疑问句形式不同于神话部分和历史部分为线索,指出前者的背景中存在巫觋集团的知识传承仪式,后者的背景中存在楚人对天命的不信任。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天问》成立于人们的关心从众神移向人的命运的时期。

在该书的后半部中,小南一郎讨论了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汪瑗《楚辞集解》诸书,从各人对屈原作品注释的态度,来考察他们是如何看待《楚辞》的。作者认为王逸不仅仅是一个注释者,同时也是楚文化圈的一员,与楚辞文艺的传承有着深切关联,朱熹晚年的著作《楚辞集注》和当时他不得志之境遇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而汪瑗则是从“自由精神”这一角度来重新解读《楚辞》的。

三、重构研究框架的努力与研究方法之革新

藤野岩友在大学期间,师从民俗学家折口信夫教授和《楚辞》学专家西村时彦及古城坦堂两位先生。正是有着这样的从学经历,藤野岩友觉得可以从民俗学以及文学史的角度来对楚辞进行研究、考察。从这一角度出发,他写下了《巫系文学论》一书。该书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当年折口信夫对于藤野岩友博士论文审查的结论是:“以民俗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在至今为止的《楚辞》研究中创立起新的鉴识方法,提出了中国上代文学的宗教起源说,其功绩甚大。”^③作者关于《楚辞》的基本观点如下:

文学起源于祭祀,祭祀需要巫,以进行人和神之间的语言交流。同时巫还要占卜,和这些相关的文辞经过变形,成为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東西。《楚辞》的《离骚》《天问》《九章》《卜居》《渔父》《远游》等,都是这样产生的。其次,巫有舞歌。《九歌》便是这个系统。再其次,巫进行招魂。《招魂篇》《大招篇》属于此类。在进行这些祭祀仪式时,不能确认巫是否和文辞相关。应该说是由祝和史来司职文辞的。在这个意义上,祝的文学和史的文学也有必要研究。但虽说巫出于祝,史则和巫起源不同,史也可能以执掌文辞之职担当巫职。综上所述,楚辞文学溯源地看是发生于巫的系统的。因此本书以《巫系文学论》为书名。^④

该书另外还附有图表以及作为增补的《楚辞相关论文》数篇。正是因为该书具有极高的独创性,故在日本文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并风靡一时。该书具有首次脱离王逸以来传统《楚辞》学的开创性。藤野岩友的论述是完全从巫这一原始宗教现象上展开的,在他看来,中国早期文学的产生、发展、甚至连分类都和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楚辞》也是如此。虽然先秦时代的楚国是一个巫风很盛的国度,这

①② [日]小南一郎:《楚辞与其注释者研究》,京都:朋友书店,2003年,第53页、第89页。

③ [日]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序言》,东京:角川书店,1973年,第3页。

④ [日]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序言》,第5页。

在《周礼》《仪礼》《国语·楚语》《左传》《汉书·地理志》等书中均有记载。但如果将一切现象都归纳于“巫”，则难免给人以偏概全的感觉。众所周知，楚辞在形成过程中是受到多重影响的，第一是受北方文学的影响；第二是受南方文学的影响，包括“二南”中的诗歌以及《孺子歌》、《接舆歌》等；三是巫系文化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在日本楚辞研究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石川三佐男^①的《楚辞》研究，构成了一个自成一家的体系，在日本的楚辞研究界堪称独树一帜。他在利用古典文献的基础上，大量运用考古资料，同时利用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考古学以及图像学等理论方法，从而使得他的《楚辞》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的境界。

石川三佐男认为，在《楚辞》研究史上，大多数研究者都是先验地将《楚辞》与儒家典籍视为同类，从政治的伦理化和理想的现实化上来对其加以阐述，而忘记了它作为中国古代南方诗歌的这一事实。其次，楚辞是二千多年前流传下来的古老文献，应该用什么样的材料来解释，才能够更加接近楚辞的原始真实面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者认为从时间上来看，当以夏、商、周时代的材料为佳，以及后续的战国及前汉时期的材料。例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升仙图、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图和近年在河南发现的楚城遗址等。从空间上来看，当以运用和楚辞在同一地域上孕育而生的、和汉民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以及和楚辞时代相当接近的三苗歌谣为佳。同时石川强调，如果单是从歌谣这一角度对楚辞进行研究，虽可以发现一些问题，但也存在着很大的危险，因为这样很容易将《楚辞》研究单一化、简单化。^②

在材料的具体运用上，石川三佐男非常重视利用新出土的考古文献和资料，并重视对于以往材料的利用和发掘。譬如，历来我们对楚辞《九歌》十一篇的理解大约有以下四种：一、楚地祭神乐歌，二、湘江民族的祭祀用辞，三、楚地的神祭祝辞，四、相连续的歌舞剧诗，所以前辈学者们往往是从屈原和楚王的关系、屈原和鬼神的关系、神人相恋、神巫相恋等视点来解释这一问题的。石川三佐男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升仙图、天公行出境以及河南省出土的天公行出境等资料出发，将以上三图中的众神灵和楚辞中所出现的神灵加以对照比较，得出了新见解。作者认为，《九歌》有可能是一组有着众多神灵将死者的魂魄送入天界并希望死者的魂魄能够得到永生的群歌。《九歌》十一篇，是在《仪礼》和《礼记》中所不能看到的代表着楚地独特的葬送文化的文学升华。^③

石川三佐男所利用的佐证材料，从时间上来看压倒多数的是战国时代和前汉时代的材料，从空间上来看压倒多数的是楚地周边出土的考古资料。同时，他还对《山海经》和《庄子》特别重视，一是因为上述二书和《楚辞》都留有原始宗教的影子，同时它们所表现出的创造力也是如此地相近。

对考古出土资料的重视，是石川三佐男《楚辞》研究的一大特点，他对考古出土资料的占有量之大是非常惊人的。举例来说，在《关于在中国葬送习俗中的司命神》一文中，作者为了对中国葬送习俗中的司命神的本质加以解释，利用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巫山县汉墓出土的棺饰用铜镜、巫山县淀粉厂出土的棺饰用铜镜、巫山县江东嘴小沟子出土棺饰用铜牌、巫山县土城坡南井坎出土的棺饰用铜牌、简阳县汉墓出土的石棺侧板书像、洛阳北魏帝王陵出土的石棺侧板升仙图、固原北魏墓出土的漆棺盖升仙图等考古出土资料，由此可见石川三佐男对出土资料的占有量之大及其熟悉的程度。不仅在日本学者中，而且在中国学者中，都很难有人能够做到这一步。

另外一个方面，石川三佐男对古典文献也非常熟知。从《〈楚辞〉九歌研究——从考古出土资料看九歌的成立时期》一文中，我们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来。作者为了将太一神的意义及其在历史上的变化轨迹说明清楚，引用了《淮南子》一书中的《天文训》《精神训》《本经训》《诠言训》《主

① [日]石川三佐男(1945—2014):文学博士,秋田大学教育文化学院教授。2010年退休,任秋田大学名誉教授。长期致力于《诗经》《楚辞》研究,相关论文60余篇,而尤以楚辞研究用力甚勤,著有《楚辞新研究》一书。

②③ [日]石川三佐男:《楚辞新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2年,第16页、第289页。

术训》《要略训》，《史记》中的《天官书》《封禅书》，与《鹖冠子·泰鸿篇》《越绝书》《前汉记·孝武皇帝记》《易纬乾凿度》《乐稽曜嘉》《乐叶图徵》，以及《汉书》中的《礼乐志》《郊祀志》《天文志》，还有《楚辞章句·九歌叙》《列子·天瑞篇》《抱朴子·论仙篇》、扬雄《甘泉赋》，《乐府诗集》中的《汉郊祀歌天地篇》《汉郊祀歌天马篇》等众多的文献资料。^①

我们可以看到，石川三佐男的研究极端重视实证，运用王国维两重证据法，在将已有书面文献与地下考古发现的文献加以对照上，下了大功夫，其功力之深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四、总结

要之，这一阶段日本学者的《楚辞》研究比之上半世纪，表现了明显的进步，他们已不满足于沿着中国乾嘉传统前进，希望能够走出一条有着日本学者自我特色的研究之路。在方法上，更重视地下文物的发现，用之以与典籍文献对照，还十分注意从民俗学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研究，可谓三重论证。在观点上，日本学者力图从哲学、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等角度，阐发个人的见解。更进一步的是，有些学者还作出了具有整体性的论述，体现出一种宏观性的眼光与建立体系的雄心。虽然见解未必都正确，但却标志了他们已经从上半个世纪仅仅将《楚辞》作为一种文化客体进行局部研究的阶段，进入到见解迭出，并力图上升到整体性理解的程度。日本《楚辞》研究的进步是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日本《楚辞》研究，确实展开了新的气象：第一，日本学者本着笃实的作风以及首先需要读懂作品的需要，本能地倾向于中国的乾嘉传统。现在，在引进中国古代的及日本学者自己撰著的注释著作已经相当丰富的情况下，他们希望能够走出一条有着日本学者自我特色的研究之路了。第二，日本学者的《楚辞》研究更多地是注意细小的、个别的、局部的问题，而不像许多中国学者对《楚辞》进行宏观的、整体的、全面的研究，这同他们努力将小事做精细的民族性格是一致的。

（责任编辑：邓晓东）

Studies on *Chu Ci* in Japan from 1950s to 1980s

WANG Hai-yuan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three decades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80s witnessed highly visible progress in the studies on *Chu Ci* 楚辞 (known in English as the Songs of Chu or transliterated as the Chu Tz'u) in Japan.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Qianjia* 乾嘉 tradition (literally the tradition dating back to the period from Emperor Qianlong's reign to Emperor Jiaqing's reign), scholars in Japan wanted to blaze a new trail in the field. Methodologically, they put more emphasis on using unearthed materials, which were compared against the classics and on adopting folkloristic perspectives, thus establishing strong arguments based on three such types of evidence. Moreover, they tried to elaborate on their opinions from philosophical, sociological, religiou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Some Japanese scholars even gave holistic accounts and explanations, which speak of their macroscopic vision and ambition to construct a holistic system for the studies on *Chu Ci*.

Key words: Japan; studies on *Chu Ci*; multi-disciplinarity; holism

①王海远：《近当代日本楚辞研究之鸟瞰》，《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